

首页 >> 历史学 >> 历史考据

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底草部分抄本存世考

2020年08月06日 09:27 来源:《南开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》2019年第6期 作者:杨永康

字号

打印 推荐

内容提要: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《明太祖实录》稿部份抄本,不少学者认定其为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抄本,此说有误。建文时期,朱棣很早就被废为“燕庶人”,抄本称其为“燕王”,恰恰证明其不可能是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。抄本记事日期、每日记事条目、内容与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完全对应,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,二者承袭关系明显,据此可以推断,抄本是现存唯一的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底草部分抄本。

关键词:《明实录》/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/《明太祖实录》底草

作者简介:杨永康,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

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《明太祖实录》稿部份抄本(以下简称《辽宁稿本》),关于《辽宁稿本》的性质,刘玉岐、潘国华二位先生认为“当属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稿之抄本”,丁亮、张会会也持相同的看法,认为“抄录‘稿本’所使用的底本应为建文帝时期编修的《明太祖实录》,极有可能是该《明太祖实录》初稿的抄本”,他们都判定《辽宁稿本》是建文帝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抄本。笔者认为刘、潘和丁、张三文对《辽宁稿本》性质的考订存在着重大失误之处,《辽宁稿本》与《明太祖实录》之间的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推敲。

一、《辽宁稿本》基本情况介绍

《辽宁稿本》原件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,笔者未曾亲眼目睹原件,刘玉岐、潘国华二位先生对其纸墨装帧有过简单的描述:“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一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巳(十二日)至六月癸酉(二十三日)实录稿抄本。此本书写材料为生宣纸和墨。据有关行家眼鉴,此纸为手工制造,主要原料是树皮,纸面不平,比毛边纸略厚;墨的主要原料是碳素、胶和香料,因经过裱糊,估计各种配料已发生化学变化。毛笔行书,间有行楷和行草。抄本页长二十五厘米、宽十三厘米,共九十九页,已裱糊装订成册;按日记事,共八十八日条(正月含十二条、二月含二十一日条、三月含十六日条、四月含十三日条、五月含十七日条、六月含九日条)。”^①对其流传情况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:“这部明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至六月的太祖实录稿抄本,原系清宫内阁大库所藏。后随大库档案散失而为罗振玉收藏,嗣经罗氏献与伪满奉天图书馆。解放后,经东北图书馆接收,现藏于我馆。”^②

比较《辽宁稿本》与今存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(“江苏本”“红格本”)的相关文本,可以发现《辽宁稿本》有以下三个特点:^③

首先,《辽宁稿本》记事日期、每日记事条目、内容与另外两本完全一致(仅江苏本缺二月丙子日,该日的内容错记在癸酉日内,癸酉日与丙子日记事前后相承,应该是江苏本漏抄所致),记事日期、条目、内容可以一一对应。只是语言、词汇略有差别,语义、内容则基本相同。

其次,《辽宁稿本》语言质朴,浅显易懂,另外两本文字更正式,更书面化一些。《辽宁稿本》文本更接近起居注、钦录簿一些,成书时间早于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。^④

最后,《辽宁稿本》讹误之处极多,涉及大量的人名、地名、职官名。丁亮、张会会对比相关文本后,“认为‘稿本’是一份由不熟悉明初情况的抄手‘听写’而成,这才产生了许多‘同音异字’的讹误”。^⑤言之有理。《辽宁稿本》讹误多的主要原因是抄手“听写”造成的,也反映出抄手明史素养极低,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。

以上是《辽宁稿本》版本原貌、流传过程、文本内容及特点的大致情况。就目前为止，笔者没有见到《辽宁稿本》的影印本，整理点校本可以参考刘玉岐、潘国华：《〈明太祖实录〉稿部分抄本》，《历史档案》1985年第3期；辽宁省档案馆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：《明代辽东档案汇编》，第四部分“《明实录》稿本”，辽沈书社1985年版。

二、《辽宁稿本》祖本不可能成书于建文年间

《辽宁稿本》祖本成书时间对认识其文本性质极为关键。刘、潘及丁、张二文认定《辽宁稿本》祖本形成于建文时期，据此他们认为《辽宁稿本》是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抄本，最主要的证据就是《辽宁稿本》不避讳朱棣的名字。刘、潘二人文章说：《辽宁本》和《江苏本》、《红格本》的成文时间究竟谁先？从三个本子对明成祖朱棣的称谓上可得到正确的答案。封建社会对当朝皇帝和先朝皇帝不能直呼其名，而呼尊称。《辽宁本》对朱棣直书其名，称之为燕王，《江苏本》和《红格本》则书为“今上”。如正月壬寅日，《辽宁本》记：“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提……觐见。”《江苏本》和《红格本》则书为：“晋王刚、今上……来朝。”二月庚申日，《辽宁本》记：“晋王朱刚、燕王朱提……均往回封地。”《江苏本》和《红格本》则书为“晋王刚、今上……俱还国。”诸如此类，载者皆是。可见，《辽宁本》对朱棣直书燕王，不避讳；而《江苏本》和《红格本》为避其讳，尊书为“今上”。这就证明，《辽宁本》是于朱棣位居燕王时纂修；朱棣登基前，独有建文朝修过一次实录，并于建文三年完稿，《辽宁本》很可能为此时所修实录稿本之抄本。而《江苏本》和《红格本》则是朱棣称帝后纂修的。据此，《辽宁本》的成文比《江苏本》、《红格本》都早。

“江苏本”和“红格本”的祖本即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。与“江苏本”和“红格本”不同，《辽宁稿本》不避讳朱棣的名字，这个现象无疑值得进一步细究，但是刘、潘二人的解释却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。他们认为《辽宁稿本》不避燕王朱棣的名讳即证明其必为建文帝所修，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建文帝时期的政治背景——“靖难之役”。根据一些史料来看，早在建文元年建文帝朱允炆就已下诏削夺燕王朱棣的王位，称其为“燕庶人”，成书于建文三年的《明太祖实录》怎么会继续称呼朱棣为“燕王”呢？谈迁《国榷》有云：

（建文元年七月）壬辰，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征北大将军，驸马都尉李坚、都督宁忠为左右副将军，率师三十六万讨燕……书谕诸王，削燕属籍，诏曰：“朕奉先皇遗诏，纂承大统，宵衣旰食，思图善政，以安兆民。岂意国家不幸，骨肉之亲，屡谋僭逆。去年周庶人橚潜为不轨，词连燕齐湘三王，皆与同谋，朕以亲亲之故，不忍暴扬其恶，止治橚罪，余置不问。今年齐王榑谋逆事觉，推问犯者，又言与燕王棣、湘王柏同谋大逆，柏知罪自焚，榑已废庶人。朕以燕于亲最近，未穷其事，今乃忘祖逆天，称兵构祸，意欲犯阙危宗社，悖逆如此，孰不骇闻。昔先皇帝时，棣包藏祸心，为日已久，印造伪钞，阴结人主，朝廷穷极，藏匿罪人，先帝震怒，遂以成疾，至于升遐，海内闻知，莫不痛忿。今不悔过，又造滔天之恶，虽欲赦之，而获罪宗社，天地不容。已告太庙，废为庶人，遣长兴侯耿炳文等，率兵三十万，往讨其罪。咨尔中外臣民军士，各宜怀忠守义，奉职平燕，与国同心，永安至治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^⑥

永乐三年官修《奉天靖难记》所载建文元年十一月乙亥《朱棣上建文帝书》有云：

今见诏内言“燕庶人父子”，岂葬父皇以庶人之礼耶？可为哀痛！^⑦

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成书于建文三年，此时燕王已被建文帝削夺号位，《辽宁稿本》果为建文朝所修实录，应该称其为“燕庶人”才对。《明太祖实录》初修时期，正值“靖难之役”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。双方经历了郑村坝之战、白沟河之战、东昌之战、夹河之战、藁城之战，战事惨烈，早已你死我活，撕破脸皮。根据笔者的考证，建文二年，燕王朱棣开始不使用建文年号，用干支庚辰来纪年；建文三年，朱棣去除建文年号，用洪武三十四年纪年，并追改建文年号。这种“去除”建文年号的行为意味着朱棣与朱允炆彻底翻脸，不承认建文帝的合法地位，不臣之意表露无遗。^⑧建文帝在削爵诏中一方面指责朱棣忘祖逆天、称兵构祸的谋反罪行，另一方面并指出，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朱棣就已经有包藏祸心、印造伪钞、阴结人主、隐匿人犯等罪行，《明太祖实录》的纂修是朝廷最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，朱允炆一定会掌握历史书写的话语权，将“燕庶人”朱棣的累累罪行大书特书。在这种惨烈的政治斗争局面下，《明太祖实录》怎么可能还会给朱棣留面子继续称其为“燕王”？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没有这种可能性。根据《万历野获编》的记载：“文皇帝新即位，以前任知府叶仲惠等修《太祖录》，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，论死籍没。”^⑨《明太祖实录》纂修者叶仲惠（《明史》本传为叶惠仲）因在实录中指斥朱棣君臣为逆党被杀。永乐初，朱棣敕修《奉天靖难记》反过来丑诋建文君臣，革除建文年号，用洪武代替建文纪年，通篇直呼建文帝名讳允炆，可以视作朱棣对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报复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在涉及朱棣史事记载时使用“燕庶人”称谓的可

能性较大。《辽宁稿本》称朱棣为“燕王”反而证明其不可能成书于建文帝之手，其祖本也就不可能是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。

丁亮、张会会进一步认为，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关于朱元璋在朱标死后欲立朱棣为太子的说法是有依据的、可能是事实，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，但是这种质疑是有问题的。他们的主要证据即来自于《辽宁稿本》“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戊寅日”的记载：“帝坐东便门，诏内大臣晓谕曰：‘朕年老，太子不幸，遂如此者，命也。古云，国有长君，社稷之福。朕第四子聪明、仁厚、勇武，与朕相同。朕欲立太子如何？’翰林学士刘山伍奏曰：‘君言是也。惟秦、晋二王如何？’帝不答，大哭而止。”

二人认定《辽宁稿本》为建文初修《明太祖实录》，这条记载又与永乐三修《明太祖实录》基本相同，因而认为永乐三修本的说法并非朱棣后来捏造。且不论《辽宁稿本》非建文时期所修《明太祖实录》，其所引史料不足为凭，就当时“靖难之役”惨烈的政治、军事斗争情形来分析，这样的记载决不可能在建文时期出现。如前所述，建文帝一定会利用纂修《明太祖实录》的机会打击朱棣，对“燕庶人”进行贬低，揭露朱棣的罪状，也一定会记载朱棣“庶出”的事实，他怎么会如此美化犯了谋逆大罪的“燕庶人”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建文帝会允许史官们用“聪明、仁厚、勇武”这样的词汇来形容“燕庶人”吗？更遑论这样的话出自朱元璋之口，且意在立朱棣为太子。如此记载将置在位的建文帝于何种境地，叶仲惠这样的史官们能不考虑吗？《辽宁稿本》这条记载明目张胆地站在朱棣一边，由此即可判断，其成书必然在朱棣取得“靖难之役”胜利之后。

作者简介

姓名：杨永康 工作单位：

分享到：

转载请注明来源：[中国社会科学网](#)（责编：崔蕊满）

相关文章